

把握基本精神 落实落细政策

1943年1月,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召开之际讨论通过正式法令《晋察冀边区租佃减租减息条例》,同时废除之前政府制定施行5年且两度修正的《晋察冀边区减租减息单行条例》。

新条例深刻把握减租政策之保障地权佃权、减租交租、照顾双方巩固团结、增加生产以利抗战的基本精神,集成运用抗战以来边区各地贯彻执行减租政策的经验和不足,用大篇幅条文来规定减租政策,比之旧条例规定更管用、更解决实际问题。新条例还十分注重发挥抗日民主政权的主导作用,创制了村调解与县仲裁、先调解后仲裁的高效解决争议办法,大大增强了减租政策的执行效力。

当年10月,边区又对新条例作出补充规定,进一步明确和细化若干减租事项,尽量堵住政策漏洞减少争议,保证减租政策真正落实落细落到实处。比如,新条例规定,地主依约收地致佃户无法生活者,应减收一部分或暂时不收并另定新约。补充规定对此法定原则事项分属地主生活优于佃户而佃户因收地无法生活、地主与佃户生活均能自给、佃户生活优于地主三种情况作了具体操作说明。

坚持目标导向 提升贯彻程度

对照“普遍、彻底”要求,边区深刻认识到各地在面上和点上贯彻减租政策程度存在严重的不平衡,必须加紧解决。1943年10月,全面梳理分析各地贯彻减租政策现状,按照贯彻程度分成五种地区。第一种是彻底贯彻了减租政策的地区,农民群众充分发动且既得利益完全巩固,生产积极性明显提高,并保证减租后按契约主动交租。第二种是基本上贯彻了减租政策的地区,农民群众尚未充分发动且既得利益还不够巩固,有个别村庄没有执行。第三种是初步贯彻了减租政策的地区,只是开始贯彻或停滞在开始贯彻阶段。第四种是尚未贯彻减租政策的新开辟地区。第五种是曾经贯彻过减租政策,一度因政权变质致减租政策被取消,农民群众利益得而复失的地区。

与此同时,边区坚持“面上求普遍、点上求彻底”的目标,明确了五种地区下一步提升贯彻程度的具体目标,推动全区域整体提升。在第一种地区,主要是巩固农民群众既得利益,纠正还残存着的减得不彻底的个别现象。在第二种地区,主要是彻底贯彻减租政策,纠正明减暗不减及其他减得不彻底现象,并依法保障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在第三种地区,主要是进一步贯彻减租政策。在第四种地区,主要是在具备客观条件时应即有计划地逐步实行减租,首先要做到初步减租,条件尚不具备时应准备实行减租条件。客观条件定为村政权已经初步改造,能为抗日服务,我方武装力量能经常进出活动,党和群众组织初步建立。在第五种地区,主要是在具备客观条件时应即逐步恢复农民群众的既得利益,条件尚不具备时应准备恢复条件。鲜明目标导向指引各地快速找准目标定位和努力方向,至1944年8月各战略区

落实党的减租政策 晋察冀边区如何

减租政策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土地基本政策,也是抗战后期抗日根据地十大政策之一。1943年至1944年,被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的晋察冀边区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普遍、认真、彻底地实行减租的部署要求,聚焦巩固发展根据地,结合减租斗争形势,稳步抓好工作落实,持续兴起全面贯彻减租政策热潮。



贯彻减租政策程度显著提升。北岳区基本地区(包括一部分较巩固的游击根据地)比较彻底地贯彻了减租政策。北岳、冀中的一部分游击根据地,过去曾实行过减租,由于被敌“蚕食”,地主曾恢复了过去的租佃关系,现在又重新贯彻了减租政策。一部分游击区(如平北、冀东大部分地区,北岳、冀中的一部分游击区)开始减租。

减租减息。

晋察冀根据地农民游行,拥护



通报典型案例 开展警示教育

北岳区是晋察冀边区的巩固区,也是贯彻减租政策的示范区。1943年上半年,却在边区所辖四分区的中心地区出现了地主相当普遍地向农民反攻的现象。四分区大部分地区抗战以来所订立的3至5年的租佃契约期限已满或即将期满,不少地主抓住《晋察冀边区租佃减租减息条例》规定的“契约期满,出租佃人得收回其土地”等有益于自己的条文加以强调扩大,乘机违法收地加租,如果农民不肯,即向政府起诉,使农民丧失土地使用权利和既得利益。

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之后,局部地区地主在执行减租政策上的反攻,标志着减租斗争从斗理斗力进入了斗法的新阶段。地主反攻最严重的四分区平山县就发生了2000多件租佃纠纷案,县党政民领导机关在斗法关头表现出无能和无

原则的让步,成为北岳区的反面典型。

7月7日,边区刊物《战线》刊登7月2日北岳区党委《关于保护农民既得利益给四分区地委的指示信》,并配发边区领导刘澜涛所作评论《打退地主的反攻,全面贯彻党中央的土地政策》,对平山县地主反攻案例进行详细通报,指出各级党委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地主阶级力量被削弱之后,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不仅不会停止,而且必然以新的更复杂的形势出现;另一方面要深刻吸取教训,在贯彻减租政策时必须学会领导与掌握合法斗争,学会援引法令中有利于农民群众的部分来保护他们的利益,在斗争中争取胜利。这次及时的警示教育,既推动平山县、四分区胜利打退地主的反攻,更为北岳区乃至全边区防反和打退地主反攻、全面贯彻减租政策夯实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干部下沉到村 助力一线攻坚

全面贯彻减租政策是一场攻坚战,村是一线主战场。组织县区干部下沉到村,深入宣传解释法令,检查减租实行情形,助力发动与领导农民开展减租斗争,成为边区一线打赢这场攻坚战的关键举措。

1943年秋收后,十一分区地委组织区级干部下沉到所有村,并建立逐户解决减租问题工作机制,迅速掀起了减租与退租运动热潮。一般工作方式是区干部到村中,先召集农民干部会,成立“减租复工委员会”,会后区村干部协同对各户进行调查与动员,再根据搜集的材料,召集租佃双方开会,提出和解决问题。区村干部分三组进行工作,第一组为评议问题组,由能掌握政策法令的干部组成;第二组为清算组;第三组为订约组。这样由第一组评议,确定处理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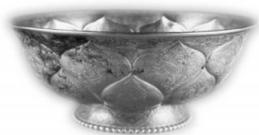
则后,交第二组清算照减应退的数字,而第三组主要掌握契约年限,订立契约。

面对一部分顽固地主的反抗,县区干部下大力气帮助村里攻坚突破。四分区井陘县石窑村过去农民没有很好地发动起来,不敢和地主斗争,因此该村的地主根本不理会会减租政策,不但加租夺佃,而且用各种办法来剥削农民。当县区干部到此村进行检查时,发现地主柴世昌过去贪污贪污粮食60石,即先抓住这个问题为重点来组织农民进行反贪污斗争和柴世昌算账,结果柴世昌承认错误,退出谷子50石麦子7石。这一反贪污斗争胜利后,提高了农民的斗争情绪,紧接着解决租佃问题,减租政策也很快得到了贯彻。

(据《学习时报》)



古代市场中的贵金属:



“真金白银”价值几何?

从古至今,金银之类的硬通货在交易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虽然历朝各代都有自己的货币,但金银的价值一直未被低估,尤其是在纸币出现前,最具保值作用的贵金属莫过于“真金白银”。那么,金银在古代市场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清代康熙年间成书的《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是一部大型类书,其中关于古代货币的记载也十分详细。通过其中文献记载,我们也能了解古代黄金与白银的流通过程。

先秦时期,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金属货币,但并未进入日常流通,少量的黄金要么用于帝王对臣子的赏赐,要么用于祭祀和礼仪活动。到了秦始皇统一货币后,发布《金布律》,将货币分为黄金、布帛、铜钱三种,最值钱的还是黄金。将金银与祥瑞结合起来帝王不在少数。三国时期吴国的孙皓,就把从地下发现的白银视为上天的赏赐。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频,在分裂时期,不同割据政权的货币制度各有不同,虽然流通者多为铜币,但由于货币制度混乱,黄金与白银在战乱时代的硬通货角色反倒得以体现。由于当时上流社会生活奢靡,朝廷财政能力低下,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很多老百

姓为了生存,不得不铤而走险,走上盗墓之路,之前的帝王墓葬大多被盗掘一空,很多金銀珍宝也因此流入民间,难觅踪迹。战乱时期,黄金与白银更具保值作用,成为很多人避险的选择,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铜币的作用,激发了人们对发掘和储藏金银的兴趣。

隋唐之后,铜币和布帛仍是主要的流通物,并出现了大量银币。在华贵的金银制品之外,白银在日常生活中更加常见。当时的金币既有皇帝的赏赐,也进入达官贵人的生活中,但对普通人来说,铜钱仍是最主要的货币。

从古至今,金银铜三种金属在货币中的价值由高到低的顺序,几乎未发生变化,这是由其稀缺性决定的。宋代以前,铜币始终是民间最为常见的货币。北宋时期,交子在四川地区出现,标志着纸币的诞生。纸币冲击了铜币的传统地位,也促进了商品贸易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南宋时期,白银完成了货币化,老百姓用白银来交易的现象越来越多。

明代前期,统治者对民间的



金银流通仍限制较多,甚至民间开矿都会被严厉处罚。朝廷力推的“大明通行宝钞”,导致中国货币制度的重大变化。但是,明代中期纸币不断贬值,老百姓不得不重拾白银,到了后来,朝廷也只好面对现实,重新开启民间白银流通之路。

1567年,明穆宗解除海禁,史称“隆庆开海”,这彻底改变了全世界的白银货币格局。这一时期,西班牙殖民者从美洲新大陆,掠夺了巨量的白银,并将它们运回欧洲。在与中国进行海上贸易时,中国将丝绸、茶叶等物品卖到欧洲,而原本在美洲的白银也由此大量流入中国。在乌拉拉、澳门等地,大量装载着白银的商船在此停泊,并逐步流入中国内地。而在与中国的贸易中,日本

大量的金银也流入中国。从隆庆开海到明朝灭亡,有超过3亿两白银从海外流入中国,这是一个极其惊人的数字。这在短期内刺激了经济的繁荣,甚至在沿海发达地区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但由于短期内流入了太多白银,打破了国内原来的货币平衡,冲击了朝廷对印制货币的垄断权,并造成明代后期经济社会问题频现。

为解决困境,张居正在改革中设置了“一条鞭法”。简单来说,就是把全国各地各种田赋、徭役和其他复杂的征收项目,按亩用白银来折算、缴纳。如此一来,大量白银进入朝廷手中,扩充了财政实力,并在日常经济活动中,也赋予白银更重要的角色。很多地方不再征收粮食,而是征收白银,这就在真正意义上确立了本银位的货币制度。此后数百年,这一制度未曾改变,在清代也基本上维持了本银位,直到1935年的货币改革,才废除了本银位制度。

在以上漫长的时间里,黄金一直主要是作为稀有保值物来储备的,黄金在日常中的流通状况始终不及白银和纸币。中国的黄金与白银的储藏和流通状况,与国家的经济状况密切相关,也与世界通行的货币制度有关。纵观人类历史,黄金是最能经得起时光考验的贵金属,这同样是由其稀缺性所决定的。(据《北京晚报》)

读史忆人 典故

鲁迅与花草

鲁迅先生从小就对花草有一种自然的亲近,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篇文章中,鲁迅先生对百草园有细致的描写,由此可以领略到鲁迅对花草植物的感情。

据鲁迅弟弟周建人回忆:“鲁迅先生自幼非常喜欢植物,他所种的大都是普通的花草,没有什么名贵或奇异的植物,这表明他是真正喜欢植物。他种的植物有映山红、石竹、盆竹、万年青、银边万年青、黄杨、栀子、佛拳、芍药、荷花、雨后天晴、羽士装、大金黄等等。草花每年收子,用纸包成方包,写上名称藏起来,明年再种。并且分类,定名称,拿《花镜》《广群芳谱》等作参考,查考新得来的花草是什么植物。”正是通过种花草,鲁迅得以掌握了它们的生长特性。

在北京居住的十几年中,鲁迅换过几次住处,只要在一处住得时间相对较长,他就爱种种草。从1924年5月到1926年8月,鲁迅住在西三条二十一号,1925年4月,鲁迅请花匠在院内种植了丁香、碧桃、花椒、刺梅、榆梅、青杨,使庭院更加幽静美观。

许广平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她生下海婴的第2天,鲁迅先生便“非常高兴地走到医院的房间里,手里捧着一盘小巧玲珑的松树,翠绿,苍劲,孤傲,沉郁,有似他的个性,轻轻地放在我床边的小桌子上。以前他赠送过我许多东西,大部分是书,和赠送给我朋友一样。这回他才算很费心想到

给我买些花来了,但也并非送那悦目的有香有色的花朵,而是针叶像刺一样的松树,也可见他小小的好尚了。”

鲁迅先生不仅自己喜欢花草,学习研究植物学,还劝别人也学习。这样的钟爱,除了喜欢、热爱这些理由及鲁迅幼年时的经验外,最重要的理由,就在于周建人所总结的:“鲁迅先生喜欢研究植物学,还别有什么理由存在,第一,他以为研究植物学材料容易拿到手。鲁迅先生又相信在当时这种社会里,每个人所做的职业,大都不会合于自己的趣味,因此,除自己的职业外,可以再学习些自己觉得有趣味的东西,这样,可以在学得知识的同时,还能得到娱乐。他以为学文字学,学进化论,都是好的,但植物学更适合于这样的目的。”

当我们翻读鲁迅日记时,便可发现,在鲁迅所买的自然科学书籍中,生物学占绝对多数,其他学科的书籍很少,其中植物学占了相当的数量。从1930年开始,直到逝世,他都一直保持给植物日记。在他的日记中,有记载的植物学书籍主要有以下多种:《汉药写真集成》《食疗本草的考察》《园艺植物图谱》《植物的惊异》等等。对花草植物的爱好,真正贯穿了鲁迅的一生。鲁迅先生在文学创作和革命斗争之余,能将花草植物的业余爱好保持如此长久,确实是罕见的。

(据《海南日报》)

拾遗

邓小平:做事关注细节

恢复高考,是1977年邓小平重新走上党和国家领导岗位后决心做的一件大事。为办好这件事,邓小平在谋划思考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同时,还十分关注一些“小细节”。

当时,教育部定的招生原则是“自愿报名、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这事儿报到邓小平那里,

他敏锐地觉察到“单位同意”会阻碍很多人报考,考生命运也将受到影响。他指出:“单位同意这一条我去掉。比如说考生考得好,生产队却不同意,车间不同意,或哪个领导的脾气不好,考生该如何是好?”后来确定的招生方针中就取消了“单位同意”这一隐形报考门槛。

(据《天津日报》)

钱玄同教子

16岁那年,钱三强在父亲钱玄同的支持下考入了北京大学理科预科。当时上课时学生问答都要用英语,这对于只学过法语的钱三强来说,很是困难。钱玄同担心儿子打退堂鼓,便鼓励他说:“既然确定了目标,就不用害怕和退缩,而是应该用艰苦的劳动去实现自己的理想!”父亲的话给了钱三强极大的鼓励,半年后,他的英文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后来,钱三强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那年,他想去国外继续求学深造。当时有消息说,留学公费生考试只有一个物理学专业的名额,钱玄同于是鼓励儿子前去应聘。经过努力,钱三强顺利拿到这个宝贵的名额。然而不幸的是,钱三强准备出国前夕,钱玄同意外得了重病。当时钱三强非常难过,一时不知该怎么办才

好。钱玄同看出了儿子的心事,将他叫到身边安慰说:“你学的科学将来对国家有用,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出国好好学习,心里不要有任何包袱。”

那天夏天,24岁的钱三强流着泪告别父亲,前往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居里实验室从事原子核物理的研究工作,指导教师是镭发现者居里夫人的女儿和女婿。得知这一消息后,钱玄同高兴地给儿子写信道:“你有了很好的指导老师,要努力攀登科学的高峰,振兴中华!”钱三强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学成回国后,成了一位著名的原子能专家。

钱玄同在教育儿子方面,除了采用激励的方法外,更多的则是像朋友一样,遇事和儿子一起商量解决,非常尊重儿子的意见。

(据《天津日报》)

吴贻芳的“破格”之举

吴贻芳是我国著名教育家,国内外享有盛誉的社会活动家,曾任民进中央副主席。

“七七事变”爆发后,吴贻芳率金陵女子大学大部分师生先是西迁武汉,再辗转到达成都。

吴贻芳深知,虽然国家处在战乱之中,但教育不能停摆,现在的战争需要知识青年冲在一线,今后抗战胜利,更需要大量人才来建设我们的国家,所以吴贻芳想尽办法使处在颠沛流离中的学生继续完成学业。金陵女子大学学生最后来到华西坝,借用华西大学的教室上课。

当时,在华西坝的除华西大学外,还有金陵大学、齐鲁大学、燕京大学的一部分学生。由于师资不足,各校商定所开课程允许五所大学学生互相选读,各校承认学生所得的学分。这种做法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便于学生在特殊时期求学,完

成学业。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吴贻芳一方面领导师生进行正常的教学活动,一方面还亲自参加和领导、支持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

吴贻芳是一位优秀的大学校长,在学校管理上,她严格按制度办事。但有一件事却是她的“破格”之举。当时化学系有一个女生叫景荷蓀,是在南京入学的,因结婚违反学校规定而辍学。当吴贻芳获悉她的丈夫为抗击日军侵占南京而牺牲的消息后,非常震惊,不仅破格允许景荷蓀复学,还在经济上给予帮助。有一次,宋氏三姐妹来华西坝参观访问,吴贻芳特意引荐景荷蓀,并对全体师生说:“为抗战,景荷蓀失去了亲人,也是为抗战,她要完成学业,把孩子教育成人。人人都有景荷蓀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抗战就一定能够胜利!”一番话让在场的人非常感动。

(据《人民政协报》)